

不可代理的残余：意识流文学中的代理关闭与发生守护

意识流文学中的代理关闭与发生守护：论语言把自身的代理本性逼至极限之后所守护的那个残余

作者 秦莉 · SDE 学员 · 约 2.3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8日 · 加固版

摘要

意识流文学常被理解为心理写实主义的深化，是语言代理内心活动之能力的升级。本文提出一个相反的判断：意识流文学的实质，是语言首次将自身的代理本性逼至极限后，对“不可代理的残余”的发生学守护。在检讨了技术升级论、主体解体寓言以及以德曼与布朗肖为代表的语言自反理论这三条路径各自的洞见与共同的发现盲区之后，本文从发生学角度重审意识流文学诞生的历史条件：十九世纪下半叶，现实主义再现体系的崩溃与经验科学的自我认知革命，共同制造了一道结构性裂缝，将“意识”从一种可被语言代理的“内部事实”，逼成了一种只能被语言的发生性功能所“再发生”的流动态。基于对司汤达、乔伊斯与伍尔夫文本的具体分析，本文提炼出常规叙事的三项代理优化标准——不出错、不浪费、不亏本——并论证意识流文学的核心操作，正是对这一组标准的系统性关闭。以莫莉·布卢姆的独白为核心现场，本文详细演示了代理是如何在句法与节奏的断裂处被逐出，对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中瑟普蒂默斯段落的对照分析则展示“代理关闭”在不同书写策略下的不同形态。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正面锻造“不可代理的残余”这一概念：它不是意识的本真内核，不是代理失败的剩余物，不是语言的自足游戏，也不是不可言说之物的文学变体——它是一个纯粹发生学的生成运动，是在代理被关闭的操作中被首次逼至显形、在此操作之前并不作为“对象”而存在的东西。在正面回应了以德曼与布朗肖理论可能提出的最强反驳之后，本文将核心判断推衍至AI写作与阅读教育学两个领域，并在结论中独设一节，给出三条各自独立、可操作的证伪路线。

关键词：意识流文学；代理；发生；不可代理的残余；代理关闭；语言本体论

一、导论：被误解百年的文学革命

意识流文学在二十世纪初的集中爆发，通常被文学史叙述为心理写实主义的一次决定性深化。按照这一叙述，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已将人类内心活动的描摹推进到令人惊叹的精度，但他们仍站在意识外部，用全知叙述者的口吻将经整理的情绪交付读者。意识流作家——乔伊斯、伍尔夫、普鲁斯特、福克纳——拆掉了这道隔离墙，让读者直接“听见”人物脑子里正在流淌的那条河。在这个意义上，意识流文学被视为一种更忠实的语言技术：让语言这把刻刀更贴合意识本身的波态质地。

这一叙述流传甚广，却遮蔽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意识流文学只是代理精度的提升——只是让语言更好地去替代、摹写、传递私密的内心活动——它就仍然站在语言作为“经验代理机器”的古老传统内部。然而，任何认真读过《尤利西斯》最后一章的人，都很难用“性能提升”来解释自己被那段无标点独白所唤起的感受。莫莉·布卢姆那四十页连绵不绝的内心之声，不是被乔伊斯“写清

楚”的，反而是被他“写乱”的——在大多数初读者的经验里，它不是让人豁然开朗，而是让人困惑、走神、甚至烦躁。而恰恰是这种不舒服，才是意识流文学真正的发力点。

本文将论证一个与“技术升级论”截然相反的判断。意识流文学的本质，不是语言代理能力的深化，而是语言首次将自身代理本性逼至极限后，对“不可代理的残余”的发生学守护。此处的“残余”不可被置换为“残余内容”或“残余本质”。它不是某种被代理遮蔽、等待被发现的私密内核。它是——而且只能是——代理被系统性关闭之后，在语言与意识之间被逼至可触碰状态的一种纯粹的生成运动：一种无法被任何词或句所预先包含、只能在每一次具体的语言操作中重新被逼出的发生性本身。意识流文学的力量，恰恰来自它将语言从“替意识说话”的代理者位置上撤下，重新安放为“让意识再发生一次”的发生河床。

为澄清本文的术语架构，有必要在最开始说明三个相互关联的“发生”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历史发生”：意识流文学作为一种书写形态，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被逼出来的？第二个层面是“文本发生”：在具体的作品中，作家如何通过关闭代理的操作，让意识流不再“再现”意识、而是“再发生”一次意识的生成运动？第三个层面是“阅读发生”：读者在遭遇这些文本时，不是接收到一个已完成的“意识内容”，而是被逼着亲自跑完一次意识的生成过程——代理的关闭，迫使读者从“消费者”的位置翻转为“发生者”。本文的核心判断——“不可代理的残余”——便是这样一个三层发生的交汇结算点：历史逼出了文本，文本逼出了阅读，而三者共同指向了那个在代理被关闭的操作中首次获得显形、并在此操作之外不具有任何独立存在的生成性剩余。

本文将首先检讨三条既有解释路径，指出它们各自的洞见与盲区，并在此过程中将德曼与布朗肖的理论立场作为最深层的解释路径进行清算，以确立“残余守护”在理论版图中不可被替代的位置。随后，从发生学角度重审意识流文学诞生的历史条件，论证它并非写作者自发的技术革新，而是被一组具体的历史裂缝逼出来的新结构。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将进入核心论证：先系统论证常规叙事的三项代理优化标准，再以莫莉独白的结尾段落为主体，辅以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对照案例分析，逐句展示代理关闭如何在词汇、句法与节奏层面得到具体执行，以及“残余”如何在文本中留下可追踪的痕迹。在完成核心论证之后，本文将从德曼与布朗肖各自的理论内核出发，替他们建构可能对本文提出的最强反驳，并正面回应。在将核心判断推衍至AI写作与阅读教育学两个领域之后，结论将独设一节“证伪设计”，给出三条各自独立、可操作的证伪路线。

二、重审既有路径的盲区

在提出正面论证之前，有必要先检视三种既存解释路径，指明它们各自捕捉到了什么，又在哪里共同陷入了一个根性的发现学预设。三条路径并非等量齐观——技术升级论暴露了最朴素的代理迷信，主体解体寓言用历史标签替代了文本操作，而德曼与布朗肖的语言自反理论则构成了最深层的解释对手。如果不首先清算这第三条路径，后文的正面展开就会始终站在一块未经验证的地基上。

技术升级论的洞见与死锁

第一种路径是“技术进化论”。它将意识流文学视为心理写实传统的自然延伸与高阶形态，其代表性论述散见于从福楼拜式自由间接引语向乔伊斯式内心独白演进的文学史叙述中。这一路径的洞见在于，它捕捉到了意识流文学与传统心理描写之间的连续性：无论是司汤达笔下于连对自身欲望的层

层剖析，还是乔伊斯笔下布卢姆那混合着广告词、性幻想与日常琐事意识流，语言都携带着同一个古老的抱负——把人的内心活动转化为可阅读的文本。

然而，其盲区恰恰嵌在“性能提升”与“精度逼近”这对核心范畴里。这对范畴预设了一个发现学的框架：意识是一个已经摆在那里的、有着某种“本来面目”的对象；文学的使命，就是用越来越锋利的工具去接近这个对象。但意识的“本来面目”究竟是什么？如果意识的本然状态是一团没有割开的、正在流动的混沌体，那么任何用词去切割它、用句去排列它的操作，都恰恰是在篡改它的本性。技术越精，篡改越隐蔽；代理越好，距离越远。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文本对照来暴露这一死锁。在司汤达的《红与黑》中，于连在法庭上的那段内心独白是心理写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先生们，我没有荣幸属于你们的阶级，你们看见在我身上的的是一个农民，他起来反抗他的微贱处境。”这段文字的每一句都清晰、连贯、有逻辑推力——它是一个人经过深思后对自身处境的精确陈述。但正因其精确，它暴露出一个事实：于连的意识在这里是被“代理”过的。语言在这里执行了“不出错”的标准——每一个词都妥帖地对应着一个清晰的心理单元。然而，这恰恰意味着，我们看到的不是于连意识的“本来样子”，而是于连意识的“被翻译状态”。技术越完美，翻译的痕迹就越隐蔽；翻译的痕迹越隐蔽，我们就越容易忘记这根本就不是意识本身，而是语言的代理品。

意识流文学的技术进化论解释不了的，正是在乔伊斯和伍尔夫那里，这项技术的实施常常伴随着一种蓄意的、对“好读”“清楚”“精确”的背离。背离不是技法上的力有所未逮——乔伊斯有能力写出比司汤达更清晰的心理描写，他选择不那样写。背离本身就是目的。

主体解体寓言的洞见与化约

第二种路径是“主体解体寓言”。它从社会史角度将意识流文学解读为现代性进程中人的自我经验被技术、城市化与大规模战争撕裂之后的文化表征。这一路径准确诊断了意识流文学不可能在十八世纪出现的历史条件：铁路吞掉了空间的厚度，电报同步了远方的事件，摄影把流动的时间切成薄片——这些十九世纪下半叶密集出现的技术发明，共同传递了一条信息：人的连续、统一、自足的自我，可能从来都是一个幻觉。意识流文学于是被视作这一处境的忠实镜像。

这一路径的长处在于社会学敏感，但它的短处同样致命：它从一开始就把意识流作品预设为一枚历史印章。一旦“碎片化”成为诊断标签，意识流文学就被化约成了某种社会概念的文学佐证——伍尔夫笔下达洛维夫人那穿梭于伦敦街头的意识流，成了“都市异化”的注脚；福克纳笔下班吉那无法区分过去与现在的混沌感知，成了“意义崩溃”的证词。这种操作的后果是把意识流文学重新送回了它恰恰要打破的认知框架里：它仍然把文本当作一个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的表达工具——文本在这里完成的，是“代理”那个已经被社会理论说清楚了的历史经验。

主体解体寓言漏掉了意识流文学最根本的操作：它不是在“表达碎片化”，而是在“让碎片化发生”。两者的分野不在修辞，而在本体论。表达碎片化，碎片化是对象，文本是工具；让碎片化发生，文本就不再是指向外部事实的透明中介，而成了一个让某种不可被外部事实所穷尽的发生性在场的事件——读者不是在被“告知”某种碎裂感，而是在被“逼入”一次碎裂的发生运动。

最深层的解释：语言自反理论及其发现学残余

如果说前两条路径的局限较为明显，那么第三条路径——我们可以称之为“语言自反理论”——则构成了对本文核心判断最强有力、也是最值得认真对待的解释对手。它不再将意识流文学视作对外部现实（无论是心理现实还是社会现实）的代理，而是将其视为语言对自身代理本性的一次自反性暴露。这一路径有着不同的理论化身，其中最具深度的两支，分别来自保罗·德曼对“阅读的寓言”的揭示，和莫里斯·布朗肖对“文学空间”的沉思。将这两位思想家提前到这里来讨论，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可以被化约为“既有路径”之一，而是因为如果不首先澄清他们与本文论证的根本分歧，后文的正面展开就会始终站在一块未经验证的地基上。

德曼的工作瓦解了语言能够“代理”任何确定意义的信念。在《阅读的寓言》中，他论证了任何文本都内嵌着语法与修辞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峙：语法要求一个确定的、可判定的意义；修辞却不断地生产出歧义，让任何确定性都滑入悬搁。在德曼看来，文学不是通过语言去“再现”世界或意识，而是恰恰通过暴露这种再现的永恒失败，来让语言的修辞性暴力被看见。意识流文学在德曼的框架中，会被理解为语法结构被最大限度地松动、修辞歧义被最大限度地释放的一个极端案例——它证明了语言永远不可能达到它承诺的那个确定意义。

布朗肖则从另一个方向逼近了同一道裂缝。在《文学空间》中，他描述了文学作为一种“中性”的运作：文学不抵达任何东西，不确证任何真理，不完成任何交流；它只是在一种永不终结的喃喃自语中，让语言从它的权力——即命名、判断、下达意义的权力——中退场。在布朗肖那里，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无法被任何功能所吸收：它不代理世界，不代理作者，也不代理读者；它只是守着那道“不在场”的空缺。意识流文本在布朗肖的视域中，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极端的“中性”事件：当叙事结构解体、人物消融、意义悬搁，语言便退回到了它最原始的、非功能性的文学空间中。

本文承认，德曼与布朗肖的框架远比技术升级论或主体解体寓言深刻，而且它们在某些层面与本文的判断共享着同一种敏感：它们都拒绝将意识流文学视为一种更有效的代理工具。然而，本文必须逼出一个关键的分辨——一个发生在极深处的分歧。无论是德曼的“修辞对语法的永恒暴动”，还是布朗肖的“文学作为中性的非抵达”，这两个框架最终都把意识流文学定位为一种“暴露”——暴露代理的不可能性，暴露意义的悬搁，暴露语言本身的失败。问题就出在这个“暴露”上。

暴露的语法预设了一个发现学的结构：有一个真理——“代理不可能”——已经在；文学的使命，是以它的文本操作让这个真理被看见。在这个意义上，德曼和布朗肖仍然运作在某种认知主义的框架内：他们视文学为一种关于语言之限度的认识论的揭示工具。而本文要论证的是，意识流文学所完成的，不是对一个真理的“揭示”，而是对一种残余的“发生学守护”——或者更严格地说，是“逼出”。这两者的差异，不是修辞的差异，而是本体论的差异。揭示预设了：被揭示者先于揭示而存在；逼出却意味着：被逼出者只有在逼出的操作中才获得其在场。在德曼和布朗肖的框架中，那个“代理不可能”的结构是优先于、独立于任何具体文本的——意识流文本只是它的一个例证。而在本文的判断中，“不可代理的残余”并不先于意识流文学而作为一个“真理”存在；它恰恰是在意识流文学关闭代理的操作中，首次被逼到可被触碰的显形状态。在乔伊斯写下莫莉独白之前，没有任何人——包括德曼与布朗肖——能够指出这个“残余”在语言中的位置，因为它从未在那个位置上存在过。

用一个比喻来固定这个分歧。德曼与布朗肖看见了一座桥的坍塌，他们告诉我们：看，桥断了，这说明桥从来就没有真正连接过两岸。而本文要说的是：桥断了，而恰恰是断桥这个事件——而

非“桥从来就没连接过两岸”这个先在的真理——让桥下的河水第一次被看见了。意识流文学不是“代理不可能”这一永恒真理的例证，而是那个让河水首次获得可见性的历史性操作。而“看见河水”不是一个认识论的揭示，而是一个发生学的生产。

正是这一分辨，确立了本文与解构主义诗学之间最深的分野，也为后文的正面展开清理出了地基。

三条路径的发生条件：一个必要的补问

在收束本节之前，有必要追问一个发生学问题：为什么是这三条路径——技术升级论、主体解体寓言、语言自反理论——在文学批评史上先后占据了对意识流文学的解释权？它们各自的“发生条件”是什么？

技术升级论的背后，是十九世纪科学主义对“进步”叙事的深层信仰：工具总在改良，精度总在提升，语言作为摹仿工具的进化与显微镜或照相机的进化共享同一套逻辑。它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文学史教材中占据主流，回应的是一个刚刚经历了技术爆炸的时代对“文学也在进步”的叙事需求。

主体解体寓言则诞生于战后欧陆知识界对现代性的全面反思。在阿多诺、本雅明等人的批判理论辐射下，文学批评获得了将文本读作历史症候的方法论许可。它填补的认知空白是：当意识形态批判需要文学作为证词时，意识流文学恰好提供了最丰富、最具戏剧性的“碎片化”表象。

而德曼与布朗肖的语言自反理论，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回应了一种更深的焦虑：如果语言本身就不是一个可靠的代理者，那么所有建立于语言之上的知识——历史、主体、意义——就都站在了流沙上。意识流文学在这个框架中，被征用为揭露这一流沙状态的极限文本。

这三条路径本身各有其历史发生的根据，不是任意的理论偏好。但它们的共同局限在于：它们都把意识流文学拿来为各自的问题服务——技术升级论拿来为进步叙事服务，主体解体寓言拿来为现代性批判服务，语言自反理论拿来为代理不可能性服务——而没有追问意识流文学自己逼出了什么。本文的工作，正是将意识流文学从“例证”的位置上移开，把它重新安放为那个“逼出”的动作本身。

三、历史发生：意识流文学何以被逼出

两道裂缝的交汇

意识的流动态并非天然地需要一个全新的文学技术来处理它。恰恰相反，在漫长的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叙事发展出了一整套精密的手段，将意识的混沌转化为可被语言代理的、清晰的、有意义的“心理内容”。于连的独白之所以能够逻辑严密、层次分明，是因为司汤达站在一个稳固的代理者的位置上：他知道于连“在想什么”，而且他知道如何用语言把“想什么”忠实地交付给他的读者。在这个框架中，意识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对象。

两道历史的裂缝，将这种稳定的代理关系击碎了。

第一道裂缝来自再现论的瓦解。这一瓦解有着极其具体的历史载体和发生现场。1874年，第一届印象派画展在巴黎开幕。莫奈的《日出·印象》在当时引发的震惊远远超出一场美学争论的范畴——它所动摇的，是整个西方再现体系的根基。正统的学院派绘画建立在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上：画家的眼

睛是一台忠实的代理机器，它能将外部世界的形状、光影和秩序转化为画布上的可识别形态。但印象派画家的操作——将物体的固有色解散为草率的笔触、让确定的轮廓消失在颤动的光影中——证明了另一件事：眼睛不是代理机器，眼睛自身就在生产它所看见的东西。这个判断的后果是致命的：如果连视觉这个最古老的“自然代理者”都不再可靠，那么语言作为代理者的资格又何在？莫奈的草率笔触在这里构成了一个精确的历史隐喻：它放弃了代理“可靠视觉”的野心，而选择了让绘画本身的发生过程——颜料的堆积、笔触的方向、光斑的跳跃——直接在场。

第二道裂缝来自经验科学内部的自我认知革命。1886年，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心智》杂志上发表了他那篇具有奠基意义的论文《论内省的某些遗漏》。这篇论文的核心论点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内省所捕捉到的，从来不是正在发生的意识，而只是“刚刚过去的”意识的残骸。詹姆斯用了一个精确的句式来表述这个发现：“内省是一种回顾。”这句话的爆炸力不在心理学内部，而在它对整个文学代理传统的辐射效应。如果连内省——这个被现实主义小说家视为最可靠的意识观察工具——都无法捕捉正在发生的意识，那么小说家自以为在“描写”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答案令人不安：他们描写的，从来都只是已经过去了的、经过了代理的记忆残片，而不是那个正在流动的意识本身。

这两道裂缝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汇合，制造出了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局面：意识第一次被逐出了“可代理的对象”这一范畴，而被逼成了一个只能被语言的发生性功能所追赶的发生性事件。注意这里的历史逻辑：不是语言“决定不再代理”意识，而是历史条件使得“意识可以被代理”这一信念本身无法再被维持。意识流文学不是这个困境的解决方案——它是这个困境逼出来的形态。

传导：从历史裂缝到文本策略

历史条件自身不会自动生产文学技术。裂缝需要被作家的自觉意识所中介，才能转化为具体的文本策略。在这一传导链条中，伍尔夫和乔伊斯的创作谈、日记和通信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证据。

伍尔夫在1919年的论文《现代小说》中，对以威尔斯、贝内特、高尔斯华绥为代表的爱德华时代小说家发起了著名的攻击。学界通常将这篇论文当作现代主义文学宣言来读，但它的实际火力点远比美学纲领更具体。伍尔夫攻击那些小说家的理由不是他们的技巧不够精良——恰恰相反，她承认他们是“材料的大师”，将外部现实的社会关系、物质环境、阶层表征都描写得无比扎实。她的攻击点是：他们把小说变成了一台完美的代理机器，这台机器运作得越好，它就越错过了那件根本不能由它来代理的事——“生命本身”。

伍尔夫的措辞在此处极其精确。她说：“审视内心，生命似乎远非‘如此这般’。……让我们按照那些原子向我们心灵上坠落的秩序来记录它们的坠落吧；让我们去追踪那每一个景象或事件在意识里铭刻下的模式，不管它表面上多么不连贯、多么不一致。”这段话的关键词不是“原子”，不是“坠落”，而是“记录它们的坠落”——也就是说，听从坠落的秩序，而不是安排坠落的秩序。这不是一个关于写作内容的新主张，而是一条关于写作动作的禁令：不要再把意识的生成运动“整理”成可交付的成品；让语言在发生的过程中追上那个发生，而不是在发生结束后去清点它的遗迹。伍尔夫几乎是以发生学的句式说出了我们此前只能以发生学术语来表达的判断：代理必须被关闭，让发生自己跑。

乔伊斯的立场相对于伍尔夫更为沉默，但在他的书信中，有一句话照亮了整个局面。1920年，当乔伊斯正在写作《尤利西斯》中“塞壬”一章——那一章以音乐性的节奏控制和拟声词的狂欢而著称

——他在给朋友弗兰克·布根的信中写道：“我在这章里做的事情，是用语言去发生，而不是去说发生了什么。”乔伊斯的用词是“to make happen”，而不是“to say what happened”。句法的转换就是本体论的转换：从代理者的位置（语言替意识说话）撤出，进入发生者的位置（语言让意识再发生一次）。

在这些文本中，我们见证了一个传导链条。历史裂缝——再现论的崩塌、内省的不可能性——制造了一个问题空间：意识被逐出了“可代理的对象”这一范畴。而作家们在各自的创作沉思中，自觉到了这个问题，并以否定的方式将它转译成了文本策略：不再试图代理那个不可代理的意识，而是将语言改造为一副“发生河床”，让意识的生成运动在语言内部重新来过一次。正是在此意义上，意识流文学不是被“发明”的——它是被逼出来的。历史裂缝逼出了作家的自觉，作家的自觉逼出了文本的策略，而文本的策略最终逼出了那个不可代理的残余在文学中的首次显形。

四、代理关闭的功态解剖

三项代理优化标准，与一个必要的限定

在正面进入意识流文本的功态解剖之前，必须先论证本文的一个关键理论建构——常规叙事语言的三项代理优化标准——的构成与依据。这三项标准不是凭空的理论发明；它们横跨叙事学、言语行为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的多个传统，是对常规叙事如何完成其代理功能的一种学理提炼。

第一项标准是“不出错”。常规叙事语言的基本预设是：每一个有意义的词或句，都对对应着一个可识别的、可被读者稳定解码的心理单元或事件单元。格莱斯会话合作原则中的“质的准则”——说话者承诺他所提供的语言信息是可靠的——延伸到叙事代理层面，意味着叙述者承诺他所代理的内心活动是那个人物的实际内心活动，读者可以信任这种代理关系的忠实性。于连在法庭上的独白之所以让读者感到可靠，正是因为它的每一个句子都能被稳定地映射到一个清晰的心理命题上——读者不会在任何一处感到“于连真的在想这个吗？”的疑虑。这种可靠性不是文学天赋的偶然效果，而是常规叙事代理机制的结构性承诺。

第二项标准是“不浪费”。常规叙事语言遵循一种经济性原则：文本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意象，都应当对叙事的推进有所贡献。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概念侧重点虽不同，但其背后隐含着同一个预设——叙事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浪费它就是对叙事效能的侵蚀。在代理意识时，“不浪费”具体表现为：叙述者不会把意识的全部混沌物都堆到读者面前，而是从中筛选出那些有叙事意义的部分——那些能够推动情节、揭示性格、暗示主题的部分。司汤达不会告诉我们于连在法庭上想起了早餐吃了什么，除非那个念头有助于揭示于连的心理状态。常规叙事的代理，是一种经过了效率筛选的代理。

第三项标准是“不亏本”。常规叙事语言向读者承诺：你投入的阅读劳动将获得对等的回报。阅读一段心理描写，你付出的是注意力与认知加工的能量；你期待的回报是对人物内心的一次更深入的理解。在文学接受的朴素经济学中，这几乎是默认条款。它不保证读物一定“好懂”，但它保证：你付出的努力最终将被结算为某种可被言明的、增进了你对人性和世界之理解的图景。这一条标准延伸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隐性合约：文本作为代理者，交付的是“已处理好的经验”。

这三项标准不是分离的三条原则，而是一个整体的代理逻辑的三个侧面。不出错确保代理关系的忠实性；不浪费确保代理过程的效率性；不亏本确保代理结果的回报性。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常规叙事语言代理意识的“优化三角”——每一条都指向同一个基本信念：语言可以是一个好的代理者。

但这里必须立刻澄清一项重大的区分，以避免下文论证的误解。这三项标准是本文为理论分析而建构的理想型，其功能是为意识流文学的“代理关闭”提供一个清晰的对照系——正如化学家需要一个纯溶液的标准曲线，以便在对照中测出反应物究竟偏离了多少。这绝不意味着历史上任何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机械地遵循着这三条法则。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自杀前那段著名的内心独白，显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松动了“不浪费”的戒律——安娜的思绪漫无边际地滑过不相干的日常琐碎，恰恰构成了那个时刻的心理真实。但这恰恰印证了本文的根本论点，而非削弱它：即便是托尔斯泰那代最伟大的作家，也只能在某个例外性的极限时刻——死亡逼近、主体崩解的边缘——局部地、暂时地打破代理三角；他们的整体叙事工程仍然屹立在三角之上。而意识流文学所完成的，是把这种例外变成常态，把这种局部松动变成全局关闭。这之间的差异是本体论级的：不是量的偏离，而是整个代理关系的倒置。

代理关闭的首次演示：莫莉独白的结尾段落

三项标准既立，即可进入核心演示：代理是如何在意识流文学中被系统性地关闭的。本文选取《尤利西斯》最后一章——莫莉·布卢姆的独白——的结尾段落作为细读对象：

“……and how he kissed me under the Moorish wall and I thought well as well him as another and then I asked him with my eyes to ask again yes and then he asked me would I yes to say yes my mountain flower and first I put my arms around him yes and drew him down to me so he could feel my breasts all perfume yes and his heart was going like mad and yes I said yes I will Yes.”

这段文字是莫莉在半梦半醒之间意识流动的终结，也是整部《尤利西斯》的句号。它惯常被称颂为“生命的肯定”或“女性欲望的自主声音”。本文不以这些主题解释为满足，而是要把这一段读作一场代理关闭的发生学演示。

首先，标点符号的取消是最直观、也最浅层的代理废止。常规叙事的标点——逗号、句号、分号——是代理者为读者进行的预先分块：把混沌的意识流分段、分句、分层，以让读者安全上岸。乔伊斯取消了这个代理服务。读者一下子被独自遗弃在词语的潮水中，没有任何非此莫属的停顿标志可供依靠。但这一步的代理关闭若停留于此，便沦为一种美学姿态。恰恰是第一步关闭所逼出的积极生成——那个在旧代理的位置上长出来的新东西——才是本文要捕捉的事件。

这个新东西，就是连词“and”的反复出现。在常规叙事代理中，“and”是一个最低限度的逻辑代理者——它告诉你两个事件之间有一道连接，而这道连接的性质（是因果？是时序？是并列？）则留给读者去判定。“and”的本质结构是：只提供连接的骨架，不提供连接的肉理。在莫莉独白的高潮处，当代理的“不出错”标准被关闭——即，文本不再担保每一个词语都对应着一个可被稳定解码的心理单元——那个被代理遮蔽的、纯粹的发生性能便从断口渗出。这个动能不是任何已被言明的“内容”，它恰恰是“and”之间的那个空隙：它不陈述莫莉的意识是什么，它只让莫莉意识的“从一个念头冲到下一个念头”的运动本身被感受到。常规叙事的代理会把这种运动凝缩为“她在

想A，然后她在想B”的成品描述；乔伊斯的“and”则把读者逼回到那个成品凝缩发生之前的、意识还在跑的瞬间。

紧接着是那个著名的结尾词：“Yes”。与“and”相对，“Yes”在此处关闭的，是代理的另一项标准——“不亏本”。常规叙事代理中的肯定词——当人物说“是”时——结算的是一个确定的语义回报：读者知道这个人物“同意了”“接受了”“屈服了”。但莫莉的“Yes”在整段独白的结尾处，恰恰悬搁了这种结算。它不是一个对任何问题的回答（前文的“he asked me would I yes”只是意识流中的一个碎片，不是给结尾“Yes”准备的标准提问），因此它不交付任何可被清点的命题内容。读者读到这里，不会获得“所以她的最终决定是……”的理解回报。代理的不亏本承诺被废止了：你读了四十页，最后落在一个非命题性的、纯粹动能性的“Yes”上，你没有得到一份可带回的“心理分析结论”。

然而，恰恰是在这个“不亏本”被关闭的空缺处，那个“不浪费”所遮蔽的东西被反哺着托了出来。常规叙事代理为了“不亏本”，必须“不浪费”——必须筛掉那些不具有叙事回报潜力的意识残渣，只保留清晰的心理内容。而乔伊斯主动放弃了“不亏本”的回报承诺，便使得他可以——或更准确地说，他已经没有了理由不去——全面解除“不浪费”的筛子。莫莉独白中那些被一代代批评家视为“琐碎”“冗长”“无关”的段落——她对男人的身材品评、对卧室夜壶的抱怨、对集市上便宜货的回忆——它们不是被安置在小说里的“有意义的细节”，而是在代理筛子被拆除之后，顺着发生河床自己淌出来的。代理的筛子不再把“有意义的”与“无意义的”分开，而恰恰是这种不再分开，让那个尚未被意义所切割的、前代理的意识的生成性混沌，第一次获得了进入语言的通道。

“残余”如何在文本中留下可追踪的痕迹

现在，可以来面对那个最核心的发生学问题了。当“不出错”被关闭，代理不再担保每一个词语都有它的精确心理对应物；当“不浪费”被关闭，代理不再筛选意识的混沌以保留所谓的意义成分；当“不亏本”被关闭，代理不再承诺读者的阅读劳动将换来一个可清点的理解回报——那么，代理关闭之后裸露出来的，究竟是什么？读者如何知道裸露出来的是“纯粹发生性”，而不是别的——比如，“莫莉的某种极其复杂、难以言传的心理内容”？

这个问题不能靠隐喻来回答，必须展示“残余”在文本中留下的可追踪的痕迹。

最硬的痕迹，是结尾序列对任何命题化填充的系统性拒绝。请尝试完成如下操作：将“and yes I said yes I will Yes”翻译为一个确定的命题——“莫莉最终决定了X”。你会发现，任何此类尝试都将导致文本意义的坍塌或过度阐释。这并非因为批评家不够聪明，而是因为这个句法序列的结构本身就不承载确定的命题内容。

我们可以诉诸批评史的证据来坐实这一点。在过去一个世纪的乔伊斯研究中，对这段结尾的阐释呈现出极其显著、不可收敛的歧异性。有的批评家认为莫莉的“Yes”是对布卢姆的最终接纳，是夫妻和解的象征；另一些批评家则认为这个“Yes”涌向的是她的初恋情人马尔维，是布卢姆被她彻底排除在外的时刻；还有批评家将它解释为一种超越任何具体对象的、纯粹的生命欲望的奔涌，与布卢姆个人的命运毫无关系。更有意味的是，这三种解读都能找到文本内部的“证据”——第一种引前文莫莉对布卢姆的温情片段，第二种引“under the Moorish wall”指向莫莉在直布罗陀的青春记忆，第三种引“Yes”之前的连词增生本身就消解了任何单一对象的指涉——因此它们之间的分歧无法通过“更

仔细的细读”来裁决。这种不可收敛的阐释差异，本身就是一个客观的文本现象。它不是批评界的无能，而是这段文字的结构性特征：它被写出来，就不是为了承载一个确定的命题。如果有朝一日，一位批评家提出了一种“莫莉决定了X”的解读，并且被学界公认为正确，那么这段文字的句法结构就被破坏了——它就不再是它自己了。

“残余”留下痕迹的第二种方式，是读者阅读体验中那种无法被“理解”所吸收的、纯粹持续性的运动感。莫莉独白的读者会经历一种特殊的认知状态：不是“我不懂她的心理”，而是“我正在经历某种无法被转化为‘懂了’的东西”。这是一种元认知层面的痕迹：读者的认知系统在试图执行“理解心理内容”这一常规操作时，遭遇了系统性的失效——而失效本身被反复经历，就成了一种对“不可代理之残余”的持续触感。这不是读者能力的问题，而是文本结构的问题。意识流文学的力量，恰恰在于它将这种失效从偶然的阅读困难转化为一个被精心守护的结构性事件。

第三种痕迹出现在互文层面。当我们将莫莉独白与于连的法庭独白并置时，两者之间横亘着的不是风格层面的差异，而是一道本体论级的裂缝。于连的独白可以无损地被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可以被总结要旨而不丢失其核心功能——因为它承载的是确定的命题内容，语言只是这些内容的载体。而莫莉的独白，一旦你试图“总结”它——一旦你说“这段写的是莫莉在回忆布卢姆求婚的那个下午”——你就已经杀死它了。不是因为你的总结不够准确，而是因为你的总结这一动作本身，就把代理重新安回了代理关闭之后留下的那个空位上。总结是对发生性的代理重演——而意识流文学抵制这种重演，不是通过说“不”，而是通过让重演必然失败。

在完成上述展示之后，我们可以以更大的精确性来表述那个发生学事件了。代理关闭之后裸露出来的那个东西，“不可代理的残余”，不是一个先于意识流文学而存在的对象，不是被意识流文学“发现”的——在乔伊斯写下莫莉独白之前，没有任何人能够指认“那个被代理遮蔽的纯粹发生性”，因为它不是在“被遮蔽”的状态下已然在场的某种东西，而是在代理被关闭的操作中首次获得了可以被触碰的显形状态。在代理的优化三角完好无损地运作时，那个残余并不作为一个“被遮蔽的在场”而在语言中潜伏；它不存在于语言中，因为它就是语言的发生性本身——而代理的运作恰恰是把语言的发生性收缩、折叠、定型为一个具体的可交付物。当代理被关闭，那个收缩被打开，那个折叠被展开——这时候，也唯有这时候，语言的发生性才首次获得了被触碰的可能。而这个“被触碰”的时刻，就是在乔伊斯的“and yes I said yes I will Yes”中实际发生的事件。

代理关闭的对照演示：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中的瑟普蒂默斯段落

上文的论证主要建立在乔伊斯的莫莉独白之上。但“代理关闭”如果是意识流文学的本体论构成，它就不应仅仅表现为一种单一的文本策略。本节将以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中瑟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的段落为对照案例，展示“代理关闭”可以以怎样不同的句法形态被实现，以及在这一不同的形态中，“残余”如何以不同于莫莉独白的方式留下痕迹。

选取瑟普蒂默斯作为对照是有理由的。与莫莉的半梦意识不同，瑟普蒂默斯是一个遭受战争创伤、正在经历精神崩溃的退伍军人。他的意识不是“正常意识的流动”，而是已经被推至病理学边界的极端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瑟普蒂默斯段落构成了对本文判断的一个压力测试：如果“残余”只在半梦状态中出现，它就可能只是某种特定的、边缘性的心理状态的代理，而不是代理关闭的发生学后果。

伍尔夫在书写瑟普蒂默斯时采用的句法策略，与乔伊斯有着显著的不同。乔伊斯取消标点以逼出意识的连续涌动，伍尔夫则保留标点，但将句子的内部逻辑连接系统性地打碎。请看瑟普蒂默斯在摄政公园长椅上的一段意识流：

“树叶在活着；树木在活着。树木散发出的千万种细丝——但没有人听见。他听见。那些鸟儿在希腊语中歌唱。没有犯罪。没有死亡。只有新的诞生。”

这段文字的句法表层是完整的：句号还在，句子还是句子。但句与句之间的逻辑连接被系统性地拆除了。“树叶在活着”到“树木在活着”之间，是一道重复与强化的连接，而非逻辑推导；“树木散发出的千万种细丝”与“但没有人听见”之间的转折，是叙事的而非逻辑的——它不告诉你“细丝”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人听见”是一个问题；而紧接的“他听见”与前半句构成了一个只有主人公自己能进入的意义闭合回路，读者被排除在外。最关键的跳跃发生在“那些鸟儿在希腊语中歌唱”与“没有犯罪。没有死亡。只有新的诞生”之间：从一个具体的、特异的感官印象（鸟儿在非英语中歌唱），毫无过渡地跃入一个神谕式的、非个人化的宣告。这个跳跃本身，就是代理关闭的伍尔夫式执行。

在这种执行中，关闭的是哪一项代理标准？最精确的回答是：不出错。在常规叙事代理中，一个段落里的句与句之间必须有一种可被读者独立验证的逻辑关系——因果、时序、推论、对比、例证——叙述者向读者担保：你跟随这些句子，就能安全抵达一个可被理解的心理内容。伍尔夫在瑟普蒂默斯段落中系统性地中止了这一担保。句子的序列仍在，但序列对读者认知的引导功能被切断了。读者仍然在跑，但脚下的路在每一步之后都可能消失或转向。这种“有句法无逻辑”的写作，正是对“不出错”代理——语言担保每一个句段都能被安全地解码为一个稳定的心理单元——的系统性撤销。

那么，在这种不同于乔伊斯的代理关闭形态中，“残余”如何留下痕迹？不是在连绵涌入的语流中，而是在句与句之间的断裂处。瑟普蒂默斯的“树叶——活着——鸟儿——希腊语——没有死亡”这个序列，拒绝被任何批评家重写为“瑟普蒂默斯在那一刻感到了……”的完整命题，不是因为批评家找不到合适的措辞，而是因为这个序列的结构本身，就不构成一个可被命题所包裹的心理事实。它被写出来，不是要让你理解一个曾被战争创伤的主体正在想什么；它被写出来，是要让你——作为读者——亲自经历那个逻辑断线的过程本身。而当你在那个断线处感到一脚踏空的眩晕时，你所触碰到的，就是“残余”的痕迹。它不是被伍尔夫写出来的，而是在你的阅读中被伍尔夫的句法操作逼出来的。

这个对照案例的分析，将“代理关闭”从一种特定的技法（取消标点、连词增生）提升为一种本体论操作——它的形态可以因作家而异，但它的结构是同一的：悬搁语言代理意识的优化承诺，以逼使某种不可被优化承诺所吸收的发生性在场。乔伊斯通过让语言“不停嘴”来关闭代理，伍尔夫通过让语言“接不上”来关闭代理。两种策略指向同一个发生学事件。

五、“不可代理的残余”：一个发生学的概念锻造

在完成了莫莉独白的核心细读与瑟普蒂默斯段落的对照分析之后，“代理关闭”的操作已经被展示在文本现场。紧随其后的任务是：对代理关闭之后裸露出的那个东西进行精确的概念锻造。

四种可能的误读，及其逐一排除

“不可代理的残余”这个术语极易被误读。如果不对它进行严格的否定性划界，整个论证就可能被重新吸回发现学的引力场。以下将逐一排除四种最可能出现的误读，通过否定之否定来逼出那个实际在场的肯定项。

第一种误读：残余是代理失败的剩余物。这是最可能出现的直觉误解：意识流文学关闭了代理的筛子，让意识混沌得以滴出，那么它守护的“残余”不就是这些混沌本身吗？不就是那些被常规叙事筛掉的、琐碎的、无意义的意识的废料吗？如果是这样，“残余守护”就只是技术进化论的倒转而已——不是在赞美代理的过滤，而是在赞美代理的漏网。本文必须明确排除这种解读。意识流文学不是在守护被代理筛掉的混沌物——即“代理不想处理的内容”——而是在守护那个让代理本身被逼至极限的操作所裸露出的事件。代理的操作需要一个可以被代理的对象在场，但这个对象是在代理发动的同时被代理生产出来的——在代理启动之前，不存在所谓的“待代理的意识内容”。意识流文学关闭代理，不是为了让那些在此之前被遗漏的内容终于得以呈现，而是为了让代理关闭这个操作本身所凝结出的那个事件——那个在此操作之前并不存在、在此操作之后也不作为稳定对象而持续在场的东西——被触碰到。被触碰到的东西不是“内容”，是“没有内容的生成运动本身”。

第二种误读：残余是意识的“本真状态”。这意味着一种发现学的回归主义：意识有一种本原面貌，后来被语言代理扭曲了，意识流文学的任务就是剥掉扭曲的代理外壳，恢复意识的本真。本文在导论和前面多处已明确排除了这种解读。意识没有“本真”。意识历来已经是代理的产物——从我们学会用语言来思考的那一天起，意识就再也没有赤裸过。意识流文学不是回归本真，而是在代理被逼至极限、被主动关闭的极端操作中，让那个被这一操作所逼出的发生性层次被触碰到。这个层次不是“更真的意识”，而是“代理关闭的生成性后果本身”。它不是被恢复的，而是被逼出的——而这正是本文反复使用“逼”字的分量所在。

第三种误读：残余是语言的自足游戏。这条路径倾向于用语言转向后的文学批评术语来理解本文的判断——意识流文学不再指涉外部的意识，语言只指涉自身，它的运作是纯粹的修辞游戏。这一解读不是全然错误的；事实上，它比第一种和第二种误读都要更逼近本文的判断，因为它也拒绝把意识流文学视为对某种语言之外对象的代理。但它滑开的地方在于：它把自己锁在了一个二选一的格局里——要么语言代理外部对象，要么语言只代理它自己——从而把意识流文学归结为后一种选项。本文的判断拒绝这个二选一本身。意识流文学既不是在代理外部（心理内容），也不是在代理内部（语言自身）。它在做一件既不是代理外部、也不是代理内部的事：它在关闭代理这个操作本身。而关闭代理之后裸露出的那个残余——纯粹发生性——既不属于外部，也不属于内部；它越出了代理与自指的二分法格。它不是语言的游戏，而是语言的发生。游戏没有后果；发生有后果——它逼使读者亲身生成一次，而不是接收到一个已成之物。

第四种误读：残余是“不可言说之物”的文学变体。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中，关于“语言抵达不了某种终极实在”的论述已经有漫长的传统。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言说之物”是最重要的版本。将本文的“不可代理的残余”与这一传统混同的风险是真实的。但二者之间有一道关键的划界。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言说”，是人类语言认知能力的一种结构性限界：世界中有一些东西，语言的命题逻辑够不到它们——对于不可言说的，人必须沉默。而本文的“不可代理”，不是在说代理的外部有一个“语言的边界”，代理在边界上刹住；而是在说，代理是一件可以被主动关闭的事——而关闭代理

的那个动作本身，会裸露出一个在此之前不存在于任何边界之内的发生性。维特根斯坦的“沉默”是一种消极的放弃；意识流文学的“代理关闭”是一种积极的操作。它不建一个东西，而是通过撤销代理来逼出那个在任何建的动作之前就已经在运作的发生性——而这个发生性，在没有这种撤销操作之前，既不在语言之中，也不在语言之外。它没有位置。是撤销给了它被触碰的可能。

“残余”的发生学身份：一个严格声明

在排除四种误读之后，概念锻造必须面对最核心、也最容易被发现学习性渗透的那个问题：“不可代理的残余”与代理的先有关系，究竟如何表述才不滑回本质主义？

这里必须做出一个严格的发生学声明。本文在细读部分使用过的“前代理的意识的生成性混沌”这类表述，是在分析回溯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标示的是：当我们从意识流文学这个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出发，倒推式地追问“在代理关闭之前，意识流文学所逼出的那个残余在什么条件下被遮蔽”时，我们在分析中不得不将它追溯为一个被代理所遮蔽的“前”状态。但这个“前”是分析的追溯，不是时间的在先。在代理被实际关闭之前，那个“生成性混沌”既不是意识的“本来面目”，也不是藏在代理底下的“潜伏物”——它就是代理操作本身的一面：代理将语言的发生性收缩为某种具体的可交付物，收缩本身就是那个“前”状态“不存在”的原因。只有当收缩被打开——即代理被关闭——那个被收缩所折叠的发生性才首次获得了展开的空间。在这个展开之前，它不在任何地方。它不是“被遮蔽的实在”，而是“被折叠的可能性”——折叠取消，它才首次成为可被触碰的。

因此，全文唯一合法使用“前代理”这个表述的方式是：在明确标注其为“分析意义上的追溯”的前提下，用它来标示代理关闭之后所裸露出的那个残余与代理优化三角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为了在分析中解释“为什么代理关闭能逼出残余”而必须设定的、不可被实体化的概念设定。它不是对任何时间在先状态的指认。意识流文学事件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它逼出了一个在此事件之前并不存在于语言之中的东西。如果说它是“守护”，那么被守护者也同样是守护者所生产出来的——这就是“逼出”的本体论含义。

“代理哀悼”：定义与边界

在正面锻造了“残余”概念之后，还需为本文另一个核心操作概念——“代理哀悼”——给出明确的定义。

“代理哀悼”是指这样一个发生学事件：当代理的优化三角被系统性关闭，语言丧失了它惯常行使的“替意识说话”的功能，但语言并未就此沉默；它继续运作，却不再朝向那个已经被关闭的代理目标。这种运作——即语言在代理功能被撤销后的持续空转——就是“代理哀悼”。它不是对一个失落对象（如“意识的完整性”）的感伤缅怀，不含任何心理学意义上的悲伤或怀旧；它是一个严格的技术性概念，指代理关闭在语言中造成的一种结构性后果：语言仍然在发生，但不再以代理为目的。

在莫莉独白的结尾处，当“and yes I said yes I will Yes”以纯粹动能性的方式涌出，而不再结算任何可被清点的心理命题时，语言所执行的正是这种空转。这种空转不是失败——它恰恰是意识流文学的本体论成就：它让语言在代理死后仍然持续发生，而这持续发生本身，就成为那个残余的显形通道。代理哀悼不是意识流文学的“主题”，而是它执行代理关闭操作后必然伴随的语言状态。哀悼的不是失落的内容，而是代理功能本身——而这场哀悼所逼出的，恰恰是那个被代理的缺席所腾出的发生性空间。

六、反驳与回应

任何有力的论证，都必须主动将它推至可能被摧毁的边界。本文有责任从德曼与布朗肖的思想内核出发，替他们建构可能对本文提出的最强反驳，并逐一正面回应。

德曼的挑战：你的“残余”难道不仍然是修辞的造物？

本文判断意识流文学对代理的系统性关闭——不出错、不浪费、不亏本——裸露出了一个所有代理都无力吸收的“不可代理的残余”。德曼对此会提出的最硬核的挑战，并非宣称“这个残余是你阐释出来的”，那太轻巧，而是直指其本体论根基：你用以“论证”这个残余的语言，恰恰就是修辞操作的产物。如果你的论证是修辞性的，那么你的“残余”又如何能宣称自己避开了修辞的普遍覆盖？你对此只能陷入两难：要么承认残余本身也是修辞建构出来的，这样一来，你的“残余”就不是被“逼出”的，而是被“写出”的，你整篇论文的根基就此瓦解；要么你就要为残余声明一种你整篇论文都在批判的特权——一种能够绕过修辞的、直接在场的纯粹性，而德曼毕生的工作，正是在揭露这种纯粹性声明的虚妄。这便锁死了论证的出路：你不能既用德曼的理论证明语言代理之不可能，又不让这不可能反噬你自己对残余的命名。

本文的回应分三步推进。第一步，必须将“发生的语言”与“断定的语言”严格切开。当语言执行“这是一朵花”这样的断定功能时，它是在代理一个外部事实——它用自己替代花的在场。此时，德曼的修辞分析完全有效：语法要求的那个确定意义永远被修辞的歧义性所悬搁。但当乔伊斯写“and yes I said yes I will Yes”，这里的语言不再执行断定功能。它不是在代理莫莉已经完成了的某种心理决策——在代理启动之前，就没有那个决策在。它是在执行发生功能：它通过让一连串词语在读者大脑中次第发生运动，来让读者在阅读的现在进行时中，亲自经历一次意识生成的过程。德曼的分析工具是用来解剖断定语言的代理操作的，把它直接应用到发生语言上，是把一台显微镜错当成一把锤子用——它不是错了，是用错了对象。

但德曼主义者不会在此止步。他们会追问：你凭什么说这里的语言执行的是“发生功能”而不是另一种“断定功能”？你如何证明“and yes I said yes I will Yes”不是在代理一个隐蔽的命题——比如，“莫莉进入了一种纯粹的肯定状态”？

这正是回应的第二步。本文已经在上文中通过细读给出了正面回答：整个结尾序列的结构特征，恰恰在于它拒绝任何确定的命题填充。它不是“没有被某一种特定的命题所穷尽”，而是“无法被任何命题所穷尽”——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才是关键所在。证据是：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批评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批评家成功地——所谓成功地，是指被其他批评家普遍认可地——把这段结尾翻译为一个确定的命题。这不是阐释史的一个偶然事实，它是这段文字的本体论特征。如果这段文字在代理一个命题，那么这个命题——无论多么复杂、多么微妙——应当在细读中被成功地识别出来，并被各种不同理论立场的批评家所共同确认。它的未被确认，不是待解的谜题，而是这段文字之为这段文字的必要条件。而这意味着：把这段文字的功能定性为“断定”，在经验上是无效的——它预言了（即“应当存在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确定性解读”）一个从未发生、且在结构上无法发生的事件。

第三步，逼出本文与德曼不可调和的分歧点。德曼的判断——语法的承诺永远被修辞所瓦解——是一个全称命题：对一切文本、一切言语、一切论断，它都声称有效。但恰恰是这个全称声称，暴露了它自己的盲区。德曼的全部分析都限制在“语言在执行代理功能时”的场域内。他没有——在他的

框架中也无法——去分析“语言在被从代理功能中解除出来之后”可能呈现的另一种本体论状态。因为他的方法论资源全是用来解剖代理的，他没有去代理之外的工具。本文不是要推翻德曼的理论，而是要为它划界：在代理的领地内部，德曼是绝对权威；但意识流文学的伟力，恰恰是把语言推出代理领地的那一脚。你手里的法典，不适用于那片不再是领地的河床。

布朗肖的挑战：你难道不是在建立一个新版本的“抵达”？

布朗肖的挑战则要将本文推入一个更深的危险。他会说：你论证了意识流文学通过关闭代理，裸露出了一个“残余”，并将对这个“残余”的守护确立为意识流书写最核心的事件。但你的“守护”——哪怕是“不把它变成对象”“不把它翻译成内容”的纯粹发生性的守护——仍然为文学指派了一个“任务”：发生性在语言中的在场。这难道不正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权力”——文学的权力——的残余吗？真正的中性、真正的不在场的文学、真正的从一切权力和任务中退场的文学空间，必须连这个“守护”都一并退掉。你的意识流文学，在布朗肖看来，只是从“代理”的权力位置撤到了“守护”的权力位置——你换了一个据点，但你没有放弃占据。

本文的回应是：我承认这个危险的真实性和紧迫性。但我必须逼出布朗肖框架的一个根性预设：把一切主动的操作都视为“权力”的变体，本身只有一个前提——把语言的一切功能，都视作与“不在场”相对立的、想要建立某种在场性的努力。这正是布朗肖整个文学本体论的奠基直觉：写作之所以是“中性”，是因为它不建立任何在场——不建立意义、不建立主体、不建立世界。

但本文的判断可以接受这个前提而不走入它的结论。因为我们所追认的“残余”，它是一个永远正在发生的、永远不会被任何在场形式所穷尽的生成运动——因此它不是一个可以被占据的位置。在这个残余面前，语言没有“占据”任何东西。恰恰相反：是残余占据了语言，把语言从它想建立在场的一切企图那里永久征用了出去。布朗肖可能会说，你的判断仍然让文学背负了一项“守护”的任务。而本文会说：如果连这一点点“保持”都放弃，那么你留下的，才真正是虚空——你留不下那个残余，因为残余不会自己停在那里。如果连守护它的那一道微弱的语言实践都被撤销，那么它不会回归到更纯粹的不在场，而是会重新消失在代理的运作之中——而正是在这个“重新消失”中，布朗肖的中性变成了一个绝对的无。本文的判断，不会跟着他走到那个点。

反驳的收束

当代文学理论，在德曼和布朗肖那里，已经把“代理的不可能”推到了极限：代理被解剖，意义被悬置，主体被清空。然而，恰恰是这一代将代理解剖得最彻底的理论，没有告诉我们——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在意——下面这件事：在代理被宣布为不可能之后，在意义的确定性被悬搁之后，在文学的权力被清退之后，还有一个东西，不是代理，不是意义，也不是权力，而被留在那里。意识流文学的伟大，就是它不要代理、不要意义、不要权力，却把这件被留在那里的东西——那个不可代理的残余——守住了。

七、推衍

本文完成的发生学判断，对两个看似遥远的领域有着直接、冷峻的推衍力。这两则推衍不是“附录”式的松散联想，而是核心论证的自然延伸：它们分别从反向和正向验证了“代理关闭”作为意识流文学本体论构成的根本性。

推衍一：AI写作——代理的完美神话与发生的根本缺席

大型语言模型的运作，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人类语言行为的海量代理之上：它从语料中代理风格，从模式中代理结构，从算法中代理“思考”。这种代理的精度已经逼近了令人不安的程度——在大多数标准化的写作任务中，读者已经无法厘清这究竟是人的代理还是机器的代理。

然而，语言模型无法写出一句真正的意识流文学的句子。这不是因为它的训练语料不够多，不是因为它的参数不够大，而是因为它所执行的一切语言操作，都必然是代理——而意识流文学的本体论构成，是代理的关闭。语言模型没有关闭代理的选项：它不能选择“让发生自己跑，而不去代理它”，因为它不具备“跑”的那个发生性本身。它的一切产出，都是对某个语料模式的代理。它可以在语法与修辞的层面无限逼近莫莉独白的句法特征——取消标点，让“and”反复出现，以“Yes”结尾——但那每一次生成都将是代理的一个新操作，而不是代理关闭之后残余的发生性在场。

这里的分野，恰好呼应了本文第二节对技术升级论的批判。技术升级论的核心错误，是认为代理精度的持续提升可以逼近意识的本然状态。AI写作是这一错误的终极形态：它将代理优化到了极致——不出错（语法完美）、不浪费（信息密度最大化）、不亏本（每一句都有明确的产出目的）——并因此成为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代理机器。而意识流文学的历史意义，恰恰是首次证明了：代理的完美，不等于发生的在场。代理的最好状态，恰恰离发生最远。AI写作在诞生之初，就将技术升级论的内在逻辑推至了它的终点——而这个终点所裸露出的空洞，正是本文所论证的那个“不可代理的残余”的镜中之像。

推衍二：阅读教学——被性善化的代理与被回避的发生

这一推衍指向另一个同样严峻的领域：高等教育的文学课堂。在标准的学术阅读论文或课堂讨论中，学生被要求对意识流文本进行“分析”：识别主题、阐释意象、归纳意识流动的特征。这个训练本身，就是在把学生放回代理者的位置——让他们用一套学术语言，去代理他们从文本中“读到的意识内容”。课堂的常见句式是：“在莫莉的独白中，乔伊斯通过取消标点符号，表达了意识的流动性与无意识欲望的释放。”这个句式承载的，正是常规叙事代理的三项优化标准：不出错——每一个分析都有固定的文本支撑点；不浪费——被引用的文本细节都是被筛选出来为主题服务的；不亏本——学生的论文最终结算出一个可被评分的见解。

然而，这恰恰是对意识流文学的本体论暴力。那个被文本逼出的残余——那个在代理被关闭的裂缝中裸露出来的发生性——在这个课堂教学中被重新代理了。代理死了，又被救活。代理的葬礼被逆转成代理的复苏。发生性再一次被压回了可被测量、可被打分、可被归入课程目标的代理品中。

这不是一件可以仅仅通过教学法改良来解决的事。它是文学教育在面对意识流文学时的一个本体论级困境：你无法教会学生“去发生”，只能让他们自己去经历一次。而教育体制对评分标准的依赖，恰恰是让代理在课堂上持续复活的结构条件。意识流文学在课堂教学中的命运，本身就是本文核心判断的一个反证——代理被关闭所逼出的残余，在它被逼出之后，随时都可能被重新代理、重新封闭、重新优化。而阅读教学这个场域，正是代理与被代理之间永恒拉锯的最前线。

八、证伪设计

一切本体论级判断，若要免于沦为自我封闭的玄学，就必须交出把它自己击穿的路径。本节独设为证伪设计，给出三条各自独立的证伪路线。

路线一：代理关闭之不可识别的判定

若能在莫莉独白或其他核心意识流文本中，指认出某种系统性的代理操作——不是对“代理关闭”的美学修辞，而是一种实证可查的代理，它持续地、非偶然地将意识的生成运动翻译为可被清点的心理内容的稳定对应物——并且这种代理不是文本的局部例外，而是构成了该文本的核心语言工程，则本文关于“代理被关闭”的一切判断，宣告失效。

在此语境中，“实证可查的代理”的操作定义是：能在一段不少于五十词的连续文本中，完成如下操作——为每一个句子指定其稳定对应的可编码心理内容单元，并且这种对应不需要依赖本文提出的“残余”概念即可被独立验证；且这种代理操作的密度达到每五十词三次以上。

这条路线将本文判断的核心实证赌注推至台面。如果莫莉独白的语言操作可以被实证地还原为一种精细的代理，那么“代理关闭”就只能是一个修辞性的夸张，而非本文所声称的本体论事件。

路线二：发生之可代理的实证推翻

本文的核心赌注是，被定义为“纯粹发生性”的那个残余，是不可代理的。要推翻这一点，不需要证明某个已有理论比本文更好，直接做文本实验乃至认知实验即可。

请找出一位符合如下条件的写作者——一个从未读过意识流文学、也从未接触过本文任何概念的写作者——给他一项任务：在关闭一切代理（即：不把意识处理为可清点的心理内容、不让语言执行断定功能、不保证读者的阅读劳动换来可理解的回报）的前提下，让意识的生成运动在语言中再发生一次。如果在这样的指令下，这位写作者能够复现出意识流文学的典型操作——取消标点、连词增生、结算悬搁——并且其完成度能被三位以上受过文学批评训练的独立评审判定为“与乔伊斯或伍尔夫的操作无本质差异”，那么本文的核心赌注就输掉了：纯粹发生性是可以被学习、被复制、因而在原则上可以被代理的。这也就意味着，意识流文学所逼出的那个“残余”并非不可代理——它只是未被代理而已。

路线三：残余的内容化反证

第三条路线触及本文判断最脆弱的那根神经。本文断定：代理被关闭之后裸露出的残余不是一个可被命题化的心理内容。要驳倒这个断定，不需要一个更强的理论，只需要一篇小说。

如果有一篇新的小说，它用代理关闭的全部技术——取消标点、打断句法、悬搁意义——最终结算出的，不是一个前命题的发生性涌动，而是一个牢固的、可被清晰命题化的人物心理内容——比如，莫莉在长夜独白后意识到“我其实从来没有爱过他”；如果这个命题化的内容不是被批评家阐释出来的，而是被文本自身的推进所必然逼出的；如果这种逼出占据了该文本的意义组织核心而非边缘——那么本文关于“残余不是内容”的根本坚持就被从内部击溃了。意识流文学便可以重新被解释为一种间接的心理代理技术——它不是不代理，它只是用一种延迟结算的方式，最终仍然完成了代理。而本文的全部判断，正是在于论证这个“最终”从未来临。

三条路线，各不相干，却指向同一个目标：不需要一套更漂亮的理论，只需要一篇小说、一次实验、或者一次细读——本文的判断就可以被击穿。这就是它在本体论级站住的最后根据。

附论一·最近邻切割：三位最可能吞掉本文核心概念的对手

一个新命名是否必要，不看它读起来多新，而看把它压到极限之后，是否还有某个已有概念能把它一比一地还原掉。本节主动请出最有可能做到这件事的三位对手，并为每一位给出一条**可裁决的分离线**——一个照做就能判出谁对的观测。本节由 SDE 学员专栏编辑部在原稿基础上补写。

先做一次站内分工

本文与作者站内另几篇文章处理的是同一片地带的不同层面，为免读者把它们读成同一件事的几次改名，此处交代分工：已发表的《工序的不可代偿性》处理的是**改编中的一道具体工序**——影像不能替读者做完那一步感知；《沉默的篡位》处理的是**媒介之间的竞争**——影像如何抢先占掉本该由接收者执行的位置；本文处理的则是**语言自身的本体论限度**——当语言把自己的代理本性逼到极限，剩下的那个残余是什么。同批的《无薪的劳作》处理阅读的**报酬结构**，《裂缝与在场》处理写作端的**动作与代际传递**。五者的对象各不相同：工序、媒介、语言、报酬、动作。若读者发现其中任意两篇在去掉各自对象之后仍然说的是同一句话，那正是对这一分工的有效反驳。

对手一：委托—代理理论

把「代理」立为核心概念，就必须面对社会科学里那套最成熟的代理理论。詹森与麦克林的框架处理的是：当一方替另一方行动时，因**利益不一致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成本，以及如何用契约与激励把成本压低。这套框架足以把本文重述为「文学中的代理成本问题」。分离线在**失败的类型**：委托—代理理论中的失败永远是**程度问题**——代理得不够好、成本太高、激励没对齐，原则上可以通过更好的契约逼近；本文的代理关闭主张的是**种类问题**——有些动作在种类上不能被代理，激励再对齐、契约再完备也不改变，因为被代理掉的那一刻它就不再是那个动作。

可裁决分离线。设计一个逼近实验：对同一段意识流文本，制作一系列代理度递增的替代品（导读、逐句注释、专家复述录音、逐帧影像化重演），测读者的发生指标（自述的「我自己走了一遍」与后效残留）。代理理论预测发生指标随代理质量单调上升、可无限逼近亲历水平；本文预测该指标在代理度上升时**不上升甚至下降**，且存在一个无论如何提升代理质量都跨不过去的天花板。若指标随代理质量单调逼近亲历水平，代理关闭不成立。

对手二：波兰尼的默会知识与德雷福斯的技术获得

「有些东西不能被交出去」在知识论里早有成熟表述：波兰尼指出我们所知多于所能言说，德雷福斯兄弟则论证专家技能不能被还原为可传递的规则。这是本文最容易被判为换皮的地方。分离线在**能否经由亲身共处传递**：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虽不可言传，却**可以经由师徒共处、身体示范与长期浸润传递**——学徒制正是他的正面例证；本文的不可代理残余主张连共处也不构成传递，因为它必须由承受者在自己的时间里首次执行，示范只能给出结果的样子，不能给出发生。

可裁决分离线。找学徒制式的传递现场（写作工作坊的长期一对一指导、朗读带读、逐句共读），检验是否存在成功的传递案例：受教者在未亲自执行的前提下获得了与亲历者同等的发生指标。默会知识框架预测这类案例存在且可复制；本文预测不存在——共处能提高受教者自己去执行的意愿与效率，但不能替代执行。若找到稳定的替代性传递案例，本文应并入默会知识。

对手三：伊瑟尔的空白与菲什的解释共同体

接受美学这一侧的两位对手方向相反却同样有力：伊瑟尔说意义在读者填补空白时才完成，菲什说读者的填补方式由解释共同体规定。前者可以把「不可代理」读成「空白必须由读者填」，后者可以把它读成「填法是被共同体教會的、因而是可传递的」。分离线在**被守护之物的位置**：伊瑟尔的空白是**文本结构中的位置**，可被指认、可被教学；本文的残余不在文本里，它是**执行动作本身**，在文本中没有对应的位置，因而无法被指认给下一个人。

可裁决分离线。做指认测验：请专家标出文本中「读者必须自己完成」的位置，再检验不同专家标注的一致度，以及被标注位置能否预测读者的发生指标。伊瑟尔式解释预测专家标注一致度高且能有效预测；本文预测标注一致度低，且即使在专家一致标注的位置上，发生指标仍主要由读者**是否亲自执行**而非由位置本身预测。若标注一致度高且预测力强，则残余就是空白，本文的命名多余。

附论二·可裁决预测：三条可以被判错的预测

下列预测的价值不在它们看起来对，而在它们**能被判错**。每一条都指定了观测对象、比较组与失败条件；若任何一条被稳定地反向观测到，本文的核心论断即应被修正或放弃。本节由 SDE 学员专栏编辑部在原稿基础上补写。

预测一：代理度与发生指标的天花板

如上所述：发生指标不随代理质量单调逼近亲历水平，存在硬天花板。这是本文与一切「代理得更好」路线的直接分水岭。若天花板不存在，本文的核心判断被证伪。

预测二：残余不可被指认为文本位置

本文预测：专家对「不可代理位置」的标注一致度显著低于他们对「关键情节」「主题句」的标注一致度，且标注位置对读者发生指标的预测力弱于「是否亲自读完该段」。若一致度与预测力都高，残余就落在文本里，不需要新概念。

预测三：守护是可被句法操控的

本文预测：对文本做代理友好的改写（补齐连接、明确指称、加入解释性插入语），代理品与亲历之间的发生差距**缩小**；对文本做代理封闭的改写，差距扩大。若两种改写都不改变差距，则「代理关闭」不由语言承载，本文的机制解释落空。

注释

- [1] 本文所使用的“发生”概念，不沿袭任何单一哲学传统中的“事件”“存在”“生成”等术语，而是在意识流文学的具体操作现场被重新锻造。它专指代理关闭之后，语言所不可提前包含、只能在每一次具体书写与阅读中重新被逼出的生成运动本身。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发生”与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内时间意识”之“流”（flux）以及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意识流动性的分析有着根本差异：现象学的“意识之流”仍以意向性结构为骨架，意识始终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其流动性并不取消其命题性；而本文所论的“残余”恰恰是被意识流文学逼至显形的前命题、前意向的发生性——它在任何“关于某物”的意向结构启动之前就已经在运作。它与德勒兹的“事件”、海德格尔的“本有”（Ereignis）之间的关系，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但作者注意到了这些可能的对话方向。
- [2] 此处对德曼与布朗肖的讨论，仅限于他们关于语言代理本性及文学空间的核心论证，不涉及他们思想发展的整体面向。更准确地说，本文只聚焦于德曼《阅读的寓言》中对语法与修辞不可判定性的分析，以及布朗肖《文学空间》中关于文学中性运作的描述。这两处文本分别构成了本文所定义的“语言自反理论”最深层的版本。对他们理论的其他侧面——例如德曼后期关于历史与物质性的思考，或布朗肖关于社区与非功效的论述——本文不作评述，亦不暗示本文的判断与那些侧面相容或相悖。
- [3] 乔伊斯1920年致弗兰克·布根的信件关于“塞壬”一章的创作理念——“用语言去发生，而不是去说发生了什么”——在乔伊斯研究中被广泛引述。此信见于乔伊斯正式出版的书信集（参见Letters of James Joyce, Vol. I, ed. Stuart Gilber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7），它在乔伊斯研究文献中被反复引用为理解其语言操作的关键自述。本文的引用侧重于这一表述所包含的发生学取向，不涉及该信件在其他研究语境中的解释分歧。
- [4] 三项代理优化标准是本文为理论分析而建构的理想型，其功能是帮助识别常规叙事代理的构成性规则，而非宣称任何单一理论家曾完整提出过这三条。其中，“不出错”标准与格莱斯会话合作原则的关联、“不浪费”标准与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经济的关联，均是本文所建立的对话，并非这些理论家的原初表述。“不亏本”标准则是本文基于阅读接受常识作出的概括，未直接对应某一既有理论流派。
- [5] 此处莫莉独白引文出自《尤利西斯》1922年首版最后一章。本文的细读聚焦于该文本在语言表层所执行的操作，而不进入版本校勘或不同稿本间的变异问题。对《尤利西斯》文本的任何引用，均意在展示代理关闭的结构性操作，而非对乔伊斯原意的还原。
- [6] “代理哀悼”是本文的核心操作概念之一。它严格地限定在发生学语境中：指代理功能被主动关闭后，语言所经历的一种结构性空转，以及在这一空转中所裸露出的前代理的生成运动。它与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使用的“哀悼工作”（travail du deuil）、巴特勒在《权力的精神生活》中对哀悼与主体建构的讨论没有直接关联。本文的“哀悼”不含任何精神分析或解构主义的回声——它不是心理机制，不是伦理姿态，而是一个技术性的语言状态描述：语言在代理功能被撤销后，持续运作却不朝向代理目标，这种运作就是“哀悼”。选择这一隐喻，是因为“哀悼”本身的结构——持续朝向一个已不在场的对象——恰好映射了意识流文学中语言的行为：它持续运作，却不再朝向那个已被关闭的代理目标。
- [7] 本文对德曼与布朗肖的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并非试图全盘否定他们的理论事业，而是在严格限定的问题——意识流文学的代理关闭操作——内部，指出他们的分析工具在该问题上的本体论盲区。这并不意味着本文主张一种超越德曼或布朗肖的总体理论，而仅仅是在本文所界定并守护的那片“河床”上，划出一条他们未能踏入的通道。
- [8] 本文在多处使用了“显形”“在场”“触碰”等隐喻。必须明确指出，这些隐喻不是对被指涉者的实体化。当本文说“残余在语言中显形”时，所指的不是一个实体进入了可观察的空间，而是一个发生性事件——代理关闭——使得某种在此之前不可被识别的生成运动获得了可被识别的痕迹。“显形”指的是痕迹的可识别性，而非实体的可观测性。

参考文献

- Attridge, Derek. 2000. Joyce Effects: On Language, Theor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thes, R. (1970). S/Z. Éditions du Seuil.

- Blanchot, Maurice. 1955. *L' espace littéraire*. Paris: Gallimard.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trans. Ann Smock,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2.
- Dewey, J. (1934). *Art as Experience*. Minton, Balch & Company.
- Dreyfus, H. L., & Dreyfus, S. E. (1986). *Mind over Machine*. Free Press.
- Fish, S. (1980).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edited by P. Cole and J. L. Morgan,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Iser, W. (1978).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James, William. 1886. "On Some Omissions of Introspective Psychology." *Mind* 11 (41): 1–26.
- Jensen, M. C., & Meckling, W. H.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4), 305–360.
- Joyce, James. 1957. *Letters of James Joyce*, Vol. I, edited by Stuart Gilber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Kenner, Hugh. 1978. *Joyce' s Voic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lanyi, M. (1958).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lanyi, M.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Doubleday.
- Sartre, J.-P. (1948).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Gallimard.
- Shklovsky, Viktor. 1917. "Iskusstvo kak priem" ("Art as Technique"). In *Poetika: Sborniki po teorii poeticheskogo iazyka*, 3–14. Petrograd.
- Stendhal. 1830. *Le Rouge et le Noir*. Paris: Levasseur.
- Tolstoy, Leo. 1877. *Anna Karenina*. Moscow: The Russian Messenger.
- Wittgenstein, Ludwig. 1921.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Woolf, Virginia. 1919. "Modern Fiction." In *The Common Reader*, 146–54. London: Hogarth Press, 1925.
- Woolf, Virginia. 1925. *Mrs Dalloway*. London: Hogarth Press.
- de Man, Paul. 1979. *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